

語焉不詳的五年

1968 年秋，饒宗頤離開他賴以成名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下南洋到星洲執掌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他本來想以新加坡為舞台，在國際學術界開壇講經授徒，遺憾的是，不到五年饒宗頤便於 1973 年秋辭職離開新加坡大學，告別南洋返回香港。饒宗頤在南洋的五年，時間雖短，卻是他盛年時期一段非常重要的經歷，也是他研究、創作、國際交流的爆發期之一。可惜的是，對於這五年，筆者所見所有的相關記載，均語焉不詳，失之簡略，甚至連基本的時間、人物和活動等都謬誤迭出。

關於饒宗頤新加坡大學執教之事蹟，最可靠的記錄當然應該是新加坡大學的官方檔案了。可惜，新加坡大學（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並沒有任何檔案文

獻，就連其任職的中文系也不大清楚饒宗頤任職的前因後果。這樣看來，除了故老相傳以及饒宗頤期間發表的論文署名外，居然毫無一份原始的材料可以直接證明饒宗頤曾經在新加坡大學執教，實在有趣！

1976 年 8 月，在饒宗頤本人距其離開南洋約三年之後，他在回憶說：「一九六六年夏，余在法京，忽接已故星洲大學校長林大波先生函，以該校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見邀，心許之而未敢遽應也，遲延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杪始蒞星洲。」¹ 他的這個回憶，應當是後來所有相關著錄的藍本，可惜實在太過簡略，而且也有謬誤。

按，當時聘用饒宗頤的是新加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1980 年新加坡大學和南洋大學（Nanyang University）合併成為新加坡國立大學（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簡稱國大或者新國大，沿用至今。不過，饒宗頤回憶中提到新加坡大學校長林大波純屬誤會。1965 年至 1967 年擔任

1 饒宗頤：〈新加坡古事記跋〉，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45。

新加坡大學的校長（Vice Chancellor）的是林溪茂，其英文名字為 Lim Tay Boh（1913—1967），根據發音被誤譯為林大波。饒宗頤雖然是林溪茂聘請的，可是兩人之間並沒有見過面；聘請前後的通信以及聘書，按照新加坡的習慣都是以英文進行，而林溪茂的署名為 Lim Tay Boh。因此，饒宗頤 1976 年回憶是根據此英文名而記錄為林大波，此後大家都沒有查證，以致訛傳。林溪茂於 1954 年獲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49 年起即在新加坡大學前身——馬來亞大學任教，1958—1962 年任人文學院院長，1962 年後擢拔為副校長、代理校長乃至校長，可惜於 1967 年英年早逝。

1965 年始，饒宗頤在法國國立科學中心訪問，研究巴黎及倫敦所藏敦煌文獻。饒宗頤被聘請前，他和林溪茂兩人當有函電往來，可惜文獻無徵。林溪茂長年服務於新加坡大學，1962 年起又擔任校領導，1965 年擔任校長，年齡不過五十出頭，正值學術和行政的盛年時期。筆者以常理推測，新加坡政府對其有相當期許，林溪茂本人應該對大學的發展有着自己的設想和規劃。而大學的發展，關鍵一條在於人才的

延攬和培養，饒宗頤被聘為新加坡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和系主任，應該是林溪茂任內的一大手筆。可惜天有不測風雲，林溪茂於 1967 年在倫敦度假時病逝。

1968 年饒宗頤抵達新加坡之後，擔任新加坡大學校長一職的是杜進才（Toh Chin Chye，1921—2012）。杜於 1953 年獲倫敦皇家醫院生理學博士，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創黨元老。他在 1954 年與李光耀和吳慶瑞創建了人民行動黨，並擔任該黨的首任主席；他也是新加坡共和國的建國元勳，1959 年至 1968 年間任副總理，1968—1975 年任科技部長兼新加坡大學校長。他和饒宗頤此前並無接觸，也沒有辦法考證兩人此後的互動。

唯一具有國際水平的學者

那麼，新加坡大學為什麼聘請饒宗頤呢？饒宗頤又為什麼決定離開培育他多年的香港大學南下新加坡呢？

實際上，原來在新加坡大學執掌中文系的是賀光中，他是中華民國開國元勳賀之才（1887—1958）的

公子，為中法混血兒，法文極好。賀光中辭職後，新加坡大學便決定招聘新人。那麼，具體是怎麼招聘的呢？其過程亦不可考。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的回憶或可一窺端倪。1968年傅吾康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任客座教授。是年9月底，傅吾康途徑新加坡，「拜訪了還不太熟悉的饒宗頤，他現在是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賀光中離職後，新大要重新招聘新主任，曾邀請我去做評審。申請人當中沒有誰的學術資格比得上饒宗頤，他是大學自中文系成立以來聘請的唯一具有國際水平的學者，雖然為期很短。饒宗頤的學術貢獻尤其得到了當時法國漢學元老戴密微的讚賞。」²以傅吾康的回憶分析，新加坡大學為中文系這個職位曾經公開招聘，傅吾康是評審委員會委員之一，饒宗頤遞交了申請；在相關的申請人當中，饒宗頤學術成就最為突出，因而脫穎而出，被選定聘用。

南下前的饒宗頤對新加坡大學也並非一無所知。

2 傅吾康著，歐陽甦譯，李雪濤、蘇偉妮校，傅復生審定：《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頁349。

饒宗頤的朋友趙尊嶽和學生龔道運（1937—2007）曾在或仍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任教。饒宗頤和曾在馬來亞大學中文系（新加坡大學中文系前身）執教的好友趙尊嶽密切唱和，來往頻繁；不過，趙尊嶽不幸於1965年病逝；龔道運曾經在香港大學念過書，師從牟宗三（1909—1995），和饒宗頤也熟悉。畢業後，龔道運在新加坡大學中文系教書。饒宗頤或許和龔道運通過氣。同時，新加坡也是饒宗頤一些朋友常來常往之地。如著名收藏家、虛白齋主人劉作籌（1911—1993）雖然在香港就職，出生地和父母卻在新加坡，因而經常往返兩地。蔡夢香，潮州著名的書畫家和詩人，是饒宗頤父親饒鏗（1891—1932）的朋友，饒宗頤小時曾跟他學過書法，當時也在新馬兩地定居。此外，饒宗頤和新加坡以及南洋學術界的人士也有交流往來，他此前曾在《南洋學報》發表過幾篇文章。總之，新加坡有故舊，學術文化藝術氛圍似乎不差；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系主任的職位頗為顯耀；更何況，新加坡經濟正在崛起，離香港不遠，這些恐怕都是吸引饒宗頤南下的原因。

1960年代中期的饒宗頤正當壯年，其學術成就

不僅在海外華人世界廣為人知，在國際漢學界也鼎鼎大名。1962年，饒宗頤因其大作《殷代貞卜人物通考》獲得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頒發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該獎以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命名，創立於1872年，可謂是當時國際漢學界的最高榮譽。此前此後，饒宗頤遊學日本、印度、歐美，一時交往都是國際學術界的巨擘，其學問、見識和人脈可謂漸入佳境漸入盛境！1962年榮獲儒蓮獎則大大提高了饒先生在國際上的知名度，這應該是新加坡大學聘請饒宗頤的重要考量。須知，新加坡大學承襲英制，一個系的教授只有一個教授，遑論講座教授的頭銜！此外，除了學術成就，林溪茂還要借重饒先生的行政能力、學術資源和人脈來擔任系主任一職，為中文系的教學研究以及人才培養規劃藍圖。以此論之，林溪茂和新加坡大學對饒宗頤是非常得器重；饒宗頤對這個職位應該也是相當得滿意的，相信自己能夠有所作為。

饒宗頤去新加坡之前，香港的友朋為之高興，特地編寫了《饒宗頤教授南游贈別論文集》，作者包括

羅香林、嚴耕望、羅慷烈、陳學霖、周鴻翔、阮廷焯、楊勇、馬泰來、張世彬八人，均為一時之選。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羅香林（1906—1978）的序文可以一窺當時人們對於饒宗頤去新加坡的冀望，因而也從側面反映了饒宗頤南渡的自我期許。羅香林寫到：「戊申八月，社燕已歸，秋蟬在樹，饒子方辭高館，駕言南征，教授星洲大學。故舊門人，惜其逾邁，祖席既張，清尊未竭，遠道勞思，臚言成集」；而後評價「饒子於學靡不有觀」，「其書流佈海內外」，「非姝暖於一學派一先生者可比，其志遠矣！」³ 學問如此高深，而新加坡也頗多可取之處，可以人地兩全其美。饒宗頤當時已經掌握了梵文，而「星洲大學舊有梵文系，今雖廢，而庋藏梵典甚富，余固知饒子於是將泛覽而有所開拓也。」另外，南洋尤其是星馬地區，清末一向是文人南下的首選之地，是中華文化遺風猶在，因此羅香林接着說：「南中久與華夏交通，禮失猶有存著，而昔之才人學士縉紳先生，過者蓋匙

3 羅香林：〈序〉，《饒宗頤教授南游贈別論文集》（香港：饒宗頤教授南游贈別論文集編委會，1970年），頁1—2。

焉。若黃公度、陳弢廠、康長素、楊雲史輩，其著者矣。鴻踏雪泥，胥留勝跡，南中父老，尚想流風，山川到今沐其寵澤。然諸公或以學術稱，或以歌詩鳴，具一體耳，而人仰贊之若此。」前賢如此風流，南洋父老如此仰慕敬重，而饒宗頤詩書畫學術無一不精，其去南洋，前途自然大有可觀。羅香林遂預測：「今饒子不徒以學術蜚聲，自詩古文辭賦長短句，至於繪事雅琴，無有不精絕者。余固知異日南中父老之人物指點相告曰：此疇者饒某居停之所也，授業之壇也，著畫之齋也，題詩之壁也，鼓琴之台也，入畫之樹也。夫豈惟南中之人物山川草木鳥獸蟲魚，有所資於饒子哉！」羅香林的這篇序描述了友朋之厚望，也反應了饒宗頤的心聲。然而，結果卻是大相徑庭，令人唏噓。五十年後，不但饒宗頤居停不為人知，連其執教事蹟亦鮮為人知！

應該說，饒宗頤對於新加坡大學的這個聘書是非常滿意的。第一，新加坡的薪水比較高，饒宗頤幾十年後曾經幾次提到新加坡大學提供的待遇不錯；第二，新加坡大學為饒宗頤的才幹提供了一個新的平台。當年香港大學的林仰山教授（1892—1974）曾破

格提拔沒有大學文憑的饒宗頤為高級講師，從而為饒宗頤的學術生涯提供了一個寬廣的舞台。饒宗頤為此至生感激，並以豐碩的成就來回報林仰山的提攜。此次新加坡大學的聘請，或許是盛年的饒宗頤在另一個更為廣闊的華人世界開席傳經大顯身手的時機。因此饒宗頤決定舉家南遷新加坡：「他們整理物品，單是家內的藏書，整整花了兩天才整理完，滿滿的二十多箱。書籍是饒宗頤的寶貝，他決定平常能夠放在身邊用的書就要盡量帶着，況且是要長住新加坡。」⁴

那裏壓制中國文化，我覺得很壓抑

不料，在新加坡的幾年卻和期許相背，饒宗頤非常不愉快。最後，原來九年的合約僅五年就黯然終止。而這五年當中，饒宗頤也小半時間逗留美國、台灣等地遊學訪問，真正問事不過三四年而已。其中的原因，饒宗頤本人有過回憶，大致是對新加坡壓制中

4 陳韓曦：《饒宗頤——東方文化座標》（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頁205。

國文化不滿。他自己說：

1968 年到 1973 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有五年時間。我在新加坡時心情不大好，那個時候，新加坡政府壓中國文化，所以後來我就跑掉了。新加坡本來請我擔任九年系主任，但是我到了第五年呆不下去，因為我在那裏做唯一的一所大學即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而政府卻根本不提倡中國文化，只提倡中國語，沒有「文」，只學華語就夠了，害怕中國文化，對大陸非常怕。時代的轉變非常有意思。我不能再住下去。《新加坡古事記》是在新加坡時編的，應該在那裏出版，可是至今才在香港出版。所以我的舊詩集取名《冰炭集》，如冰與炭。這跟當時的心情有關。假如我不以中國文化為重，而以個人的生活為重，我就不會這樣了，生活待遇上那是很不錯的。所以我離開之後，反而做了許多

事情。我完全以中國文化做主體的。⁵

1960 年代末的新加坡剛剛獨立建國不久，在冷戰的風雨當中投入了西方陣營。新加坡政府當時一方面允許學華文，另一方面壓制研究中華歷史、文化，冷凍、切斷中華血脈。饒宗頤對此十分不滿。他在新加坡時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整理新加坡的金石文獻，研究提倡新加坡歷史和華人華僑史，先後完成《星馬華文碑刻繫年》和《新加坡古事記》。可是，他個人的這種努力，和整個社會以及大學的氛圍尤其是執政當局的政策導向是格格不入的。對此，饒宗頤在 1989 年有過側面卻尖銳的批評。他說：

夫河山有表裏，文化亦有表裏。今人之所追逐者，唯富是求，然富之至義，非資財貨殖之為富也；有內富也，猶人之有內美也。內美惟何？立國之道，有不可動

5 饒宗頤述，胡曉明、李瑞明整理：《饒宗頤學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5—66；底線部分又見胡曉明：《饒宗頤學記》（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 年），頁 81。

搖者，以文字歷史為其長久之根柢，國之靈魂繫焉。文字，非語言之謂也；必循其聲音形體，反覆其義，進焉以究其道。乃世有外尊語言而內蠲其文義者，有貌崇義理而徒繡其鞶帨者，是存皮而去其骨，買櫝而還其珠也。顧體國經野，其塗多端，有好為長久之遠慮者，亦有喜求一時之炫耀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在智者，自擇而已。⁶

這段話把新加坡當時學華文拋棄中華文化的政策譬喻為買櫝還珠，現在看來，愈見饒宗頤的遠見卓識，令人掩卷長歎。

讀者或有疑問，是否會因為饒宗頤是中華文化大師而對新加坡的文化政策過分敏感呢？當時也在新加坡南洋大學執教的德籍漢學家傅吾康教授的話可以佐證釋疑。1988年傅吾康應饒宗頤的再度邀請，為《新加坡古事記》作序。而在十八年前的1970年，傅吾

康已經為此書稿寫了一篇序言。1988年他補記說，當時距離前序已將近二十載：

此時此刻，大家或期望新加坡當局對於中華文化傳統會給予更多考慮。惜乎事實恰恰相反。數年前，以中文為媒介的南洋大學被關閉，併入新加坡大學合成為以英文為媒介的新加坡國立大學。陳荊和和陳育崧編撰的重要著作《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被迫於1973年在新加坡外的香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饒宗頤教授的古事記已經無在新加坡出版的可能。雖然，鄙人樂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計劃出版饒教授的這部文稿。如此，至少一些新加坡人可以藉此為其國史嚴重忽視中華因素而表達關注。⁷

6 饒宗頤：〈新加坡古事記引〉，頁 xi。

7 Franke Wolfgang (傅吾康)：“Foreword”，饒宗頤編：《新加坡古事記》，頁 ix。序言為英文，筆者譯為中文。